

## 第六章 走 向 新 生

第六批  
特赦第  
一 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秦城监狱礼堂召开  
第六批特赦战犯大会。

大会仍由公安部姚局长主持。

全体在押战犯排队入场，获赦人员坐在前排。  
在讲台左侧设有家属代表席，方靖的儿子为这批特赦人员的家  
属代表。

姚局长讲话以后，家属代表讲话。方靖的儿子发言，除了  
感激党和政府对他父亲的宽大特赦外，对在押战俘表示了希望  
和鼓励。

方靖和孔庆桂代表这批特赦人员发言，再一次认罪，并表  
示特赦后不忘自己是有罪之人，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把有  
生之年的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

黄维代表在押战俘发言，表示要向已获释放人员学习，努力  
改造思想，争取早日获得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谅解和宽大。

方靖是第六批特赦第一名，其余特赦人员在京的还有四名：

孔庆桂 前国民党江阴要塞中将司令，保定军校第三期毕

业；

牟中珩 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

杨光钰 前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副军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李佩青 前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

特赦大会从上午九时半开到十一时许。宣布散会后，特赦人员捧着政府发给他们的衣物，先行出场，摄影记者紧跟着，一些管理人员早在花园等候送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派人事科干部老任坐一辆大轿车到秦城来接特赦人员。

时间已是正午，举着摄影机的记者，还在一旁等候特赦人员坐上汽车的镜头，然而五名特赦人员却在流着泪与管理员依依话别，尤其是杨光钰，竟握着管理员的手，痛哭失声。

一九四九年一月平津战役时，第三军守石家庄被歼，中将军长罗历戎和中将副军长杨光钰先后被俘。因为当时第三军还有两个营在顽抗，解放军便动员杨光钰去阵前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杨光钰当面允诺，走在中途却突然窜入老乡家，抢把菜刀就往自己脑袋上乱砍，幸得跟随的解放军抢救，自杀未遂的杨光钰，被送进解放军医院治疗。他又趁人不备，用香烟头点燃棉被，引起一场大火。大火被解放军扑灭，杨光钰双腿肌肉组织烧坏，只好将双腿自膝下部分截去。转到秦城监狱后，人民政府又在北京假肢工厂给他订做了一副假腿。

如果说其他战犯获得特赦是共产党给了他们第二条生命，

那么，特赦对杨光钰意味着共产党给了他第五条生命！因为除了他两次自杀未遂，是共产党救活外，这十七年重残余生，无疑也是共产党所给予的。这大概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狱里，都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一个重残的犯人，在关押了十七年之后，竟然会健康地走出监狱！过去十七年，杨光钰的生活，无疑是要靠监狱管理人员关怀照顾。现在即将与恩人分别，他怎能无动于衷呢？

犯人和监狱管理人员分别时，竟会出现如此动人场面！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摄影记者当时拍下了这动人的镜头，就不知经过十年浩劫，这可贵的镜头，是否还保存在档？因为第六批特赦后仅两个月，就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从秦城到东四旅馆，已是午后一点多钟了。旅馆食堂准备好一桌饭菜招待，虽然没有上酒，但是菜肴极为丰富。

饭后他们都到早已准备好的客房漫谈。全国政协干部老任对方靖等人说：“在正式分配工作以前，政府发给你们每人每月生活费六十元。这六十元由你们自由支配，也可以寄钱回家，让家里人高兴高兴。”

特赦后的待遇，方靖等人早就很清楚。因为先期特赦人员，曾去秦城探望过他们。从谈话中得知，特赦后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为学习期（到农场或工厂参加劳动），每月生活费是六十元。一年后分配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工资是一百元。升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工资是二百元。

老任谈的第二件事是选一个组长，他建议由李佩青担任。理由是李的身体好，年纪也较轻一些，东四旅馆距政协全国委

员会机关所在地较远，联系事情不免要跑跑颠颠，所以李佩青比较合适。

这一点，众人毫无异议。

方靖提出一个问题：“今后怎么称呼？”老任明确地回答：“称同志，也可以称我‘老任’。因为你们特赦后便有了公民权——是人民的一员了”。

五个人面面相觑，似乎有些怀疑。尤其是前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李佩青更惶惶不安。因为一年前作为战犯去上海参观访问，住在华山饭店，他冒冒失失地称服务员为“茶房”，在生活会上检讨了多次都过不了关，不免至今心有余悸。

老任还亲切地对大家说：“从现在起，你们一切行动都自由了，可以随便到街上去逛逛。老方在北京有家，可以随时回家看看儿子、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他还讲了一个“笑话”：“沈醉在特赦后，我们叫他出去逛逛，他就是不教。后来试着走出去，出了大门便东张西望，走在街上还不时回头看看，总怀疑有人监视他，钉他的梢——这或者是过去当过特务的条件反射吧。”

开始新生  
活烦人的  
“新”问题

老任临行发给每人六十元人民币和三十斤粮票。李佩青拿到粮票，掰着手指头细算了一会，还是没搞清楚，便问方靖：“这三十斤粮票吃一个月，每天是几斤？每餐是几两？”原来这位前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在算账上向来有点糊涂。在秦城改造时，他负责管理劳动组，每次外出劳动，排队点名，不是多点一名，便是少点一名。因为有时他忘了把自己算在总人数内，有时又把管理员也算在其数之内。方靖告诉他：按三十天算，

每天一斤，按一日三餐算，每餐三两三钱，还有三两结余；按三十天算，每天只能吃九两二钱，将每月三十天结余的加入进去，最后一天还要亏一点哩。”

前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在一旁搭话：“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每餐三两，剩下的到月底改善生活——一次吃光！”

李佩青一听就愁了！原来他是秦城在押战犯中食量最大的一个，每次外出参观访问，因为是包饭，管理员不知大家吃饱了没有，总是先问李佩青。只要李佩青回答说“吃饱了”，管理员便确信大家都吃饱了，也就放了心。在秦城伙食不限量，现在骤然要他“精打细算”，他怎么能不发愁呢？

方靖的儿子在一旁听了，便告诉李佩青，外面早点铺卖油饼可以不收粮票。他连声道谢，第二天一早就跑出旅馆找早点铺饱餐了一顿——一次竟吃了六个油饼。后来他的缺粮问题，是依靠方靖、孔庆桂和杨光钰三人的结余支援解决的。孔庆桂余粮最多，他每月有二十一、二斤粮食便足够了。

第二天午饭前，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孔庆桂想要在旅馆食堂买一份糖醋黄鱼，但不知是否超过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请小组讨论。于是五个人坐在房里，十分认真地研究“吃鱼的问题”。

看来这个问题有点可笑，但却有它一定的原因。这些人与社会（而且是新社会）隔绝了十七年之久，虽然也曾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但是对新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可以说毫无了解。他们对旧社会劳动人民家无隔夜之粮的苦处是很清楚的，不敢设想新社会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有多大提高。特

赦之前，监狱领导找他们谈话，他们曾提出：“特赦后生活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领导只能作原则回答：“你们特赦后，政府给的待遇很高，远远超过一般劳动人民。所以切记不要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要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保持一致，不要太突出了。”但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究竟有多高？吃鱼是否就超过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他们一无所知。

组长李佩青板起面孔说：“老孔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到食堂吃饭，只能挑选最便宜的菜买一样，至多再买一碗汤就足够了。”

牟中珩反对：“我……我不同……同意！我们在……在秦城，每……每……每餐还有……有荤有……有素哩！”原来这位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有严重口吃的毛病。杨光钰当即表示支持：“就是嘛，我们在秦城每星期还有两餐大肉吃，买条鱼有什么不可以？”方靖赶紧接碴：“我认为偶然吃条鱼，可以看做改善生活。”李佩青坚持己见：“我们刚出来第一天过自由生活，怎么可以马上便想到改善生活呢？应该首先想的是艰苦朴素！”

争执十分激烈。

牟中珩性子急，急起来更口吃得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于是满头大汗。他抓起笔来写了张字条，请方靖代念：“食堂的鱼做来是卖给劳动人民吃的，我们现在也是人民的一员了，就可以买鱼吃！”

组长孤掌难鸣，于是作了有条件的妥协：“好，我同意买鱼吃，但要本着节约原则——你们两人买一份，尝尝味就得。”

我不吃。”然而到了食堂，他看见几乎桌桌都有鱼有肉，他认为除他们几个以外的旅客，必然都是劳动人民了。既然劳动人民都吃鱼吃肉，那么，他们吃点鱼肉，便不能算特殊。因此他也动摇了——他买了一份红烧肉。于是本周生活会有新的题目。孔庆桂与牟中珩质问组长：为什么他一个人买一份红烧肉，却规定他们只能两人共买一份鱼？本来这问题不妨实话实说，但李佩青为顾全组长尊严，强词夺理：“肉嘛，我们在改造机关天天吃，不算‘突出’和‘浪费’；鱼嘛，就不同了，在改造机关只有过年过节才吃鱼！”这就惹起了众怒，四个组员一齐向组长开火：

孔庆桂翻了旧账：“在秦城你用一块瘦肉换别人两块肥肉，后来又抬价：一块换三块！这才是严重的剥削思想！高利贷作风！”

此事闹得不可开交。还是先期特赦的廖耀湘去旅馆看望他们，得知后，以“先进者”资格排解开了：“吃条鱼怎么能算突出呢？更谈不到浪费了。所谓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指的是去馆子里摆桌请客。在食堂里吃是很正常的，即使偶然上馆子吃一餐，也是改善生活嘛。你们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派干部去东四旅馆访问，并用一辆敞篷小车接他们去逛百货大楼。这是他们特赦后第一次走上街头。但是，第二次他们上街，却费了周折。

先期特赦留京人员大多数都到东四旅馆拜访过他们，唯有第一批特赦的王耀武和第五批特赦的王陵基因病未能前去。方靖等人便商议去那两位住处拜望。却不料孔庆桂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街上有人盘问我们，该怎么回答？”

是啊！第一次上街有市委干部作陪，这次没有“保驾”的了，如果被人盘问而又不能使人相信，后果会是很严重的吧？！

李佩青支持孔庆桂的疑问：“是的，是的，这个问题真是非同小可啊！”

当然，在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决无盘问路人之事。更何况他们的脸上也没有写明“战犯”二字，怎么会受人怀疑呢？但是，两人有此疑虑，也决非凭空想象，而是有如此这般的经历，使他们成为惊弓之鸟。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时，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感到“大事不好了”，于是“挂印封金”，弃官逃往贵阳。脱下将军服，买了两部载重卡车，摇身一变，成了运输行的老板。贵阳初解放，有一次他带车跑生意，中途遇解放军盘查，发现他戴一块金壳阿美加手表，便怀疑地问他：“你真是做生意的吗？我看你倒象国民党的大官哩。”这也不过是猜测而已，当时并未留难。但是他心虚，吓得他回贵阳就廉价将手表卖掉了。事后他琢磨：为什么共产党一个士兵会有如此敏锐的观察力？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现在他们处于经共产党教育了十八年的人民群众汪洋大海中，也就更可能一眼便识破他们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战犯，因而引起许多麻烦。

李佩青在河南解放前夕逃往重庆，脱下中山服，穿起长衫，摆了个书摊，成了小贩。根据他的“经验”：犯人只要跑出二百里，便可以逍遥法外。他忘了那是在蒋介石统治下的“经验”。他万万没有料到：重庆刚解放，他就被人民群众揭发逮捕了。因此他笃信：群众的眼睛果真是雪亮的。

经过反复研究，五个人得出的一致意见：把特赦证带在身上，以备盘查！

王耀武住在和平里，与李以勤、范汉杰、罗历戎、杨伯涛同住一幢楼。方靖等人打听好了乘车路线，便搭车前去。在车站上车时，他们都很有礼貌地让别的乘客先上，唯独最后一位女乘客还没有上车，这五个人就争先恐后起来，几乎把这位女乘客挤倒。当然，上车后他们受了一场指责，也赔了许多不是，却也是哑巴吃黄莲——有说不出的苦。因为全国政协干部老任在第一天跟他们漫谈中，讲了一个“笑话”，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特赦后和爱人去乘车，也是很有礼貌地谦让再上，把最后一位女同志让上车后，公共汽车开跑了——原来那位女同志是售票员！这“笑话”被他们当成了教训加以记取，才发生了误会。后来他们请教了方靖的儿子，才恍然大悟：肩上挎着票夹子的才是售票员，而且也不一定是女同志。

王耀武当时病已危笃，据说是脑血管硬化，以至手足颤抖。他告诉方靖等人：据医生诊断，他还可以拖两年。实际后来他是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病逝的。

王陵基住在全国政协礼堂对过什锦坊街的一个大院里。方靖等人见了他，只不过谈了几句便吓跑了。原来王陵基有满腹牢骚，他说他已特赦一年半，同批特赦的都已分配了工作，拿一百元工资，唯独他不给分配工作，还拿六十元生活费，真是太不公平了！说着说着老毛病又犯了——直眉瞪眼地说：“你们都莫开腔（说话）了，现在毛主席来找我谈话了，一定是要我去做点大事了……”

特赦后第三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方靖在儿子陪同下，来到儿子家中，和孙儿、孙女们团聚。

方靖的五个孙儿、孙女当时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五岁。方靖在押期间，孩子们都去看望过他，所以对爷爷是有印象的。现在爷爷回家来了，五个孩子立刻把他围在中间，最小的孙女甚至爬到他身上，亲亲热热地叫着“爷爷”。方靖再也忍不住了，泪水象棉线似的滚滚而下。他不仅十七年没有过家庭生活，就是在十七年前，追随蒋介石——陈诚的三十年中，与家人子女团聚在一起的时间，算起来也不超过一千天。因为他率部进川之前，总是把家眷留在“后方”，每年只回去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周。后来虽然在四川比较长时间的驻扎，前后算起来也有三年多，但是部队在整训，他又兼任了四个专区的警备司令，军、政事务冗繁，经常在各地穿梭巡视，加之受训、召见、开会等等，实际在家时间极少。所以他根本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天伦的乐趣。现在骤然走进了这样一个热闹的家庭，他的欣慰是可想而知的。

大约过了三天，北京市委统战部邀请方靖一家去北海公园游览，孔庆桂等人也一同去了。方靖十分兴奋，带着孩子们登上北海高塔，还许愿说，在近期内要带孩子们游尽近郊名胜古迹。那四位见方靖一家如此欢乐，既羡慕，又难过，因为李佩青与家人多年未通过音信，孔庆桂家在贵阳，牟中珩家在山东，杨光钰一家已去海外，下落不明。方靖见此情况，便与儿子商量，请他们四位到家中便饭。那四位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江汉军区敌工部部长沈德纯，已调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他一直很关心方靖的进步，常向先期特赦的人打听方靖在里面改造情况。所以在方靖获得特赦后，便派政协干部老陈去约请方靖到湖北餐厅便饭，并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宋希濂作陪。

沈主任要了几样菜和每人一份武汉有名的小吃——豆皮，并勉强方靖喝了一杯啤酒。这是他当国民党营长以后四十年来第一次喝酒。

席间他们很自然谈起过去在荆门作战，以及在大洪山集训的情况。

方靖说：“在荆门战役失败后，我曾再三反省失败的原因。论部队的素质，七十九军不可谓不强；论兵力，七个团亦不能说少。当时我只有归咎于十四兵团作战计划不周，蒋介石下野失去了战斗意志，始终不肯承认是主观原因——内战不得人心。军心厌战是必败的根本；民心向背失去了作战基础，决不该埋怨某个人。”

宋希濂也说：“当初荆门失守，我埋怨老方。但是，后来自己也束手就擒了，才明白决非某个人作战不力，关键在于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原来宋希濂最后官至豫、鄂、皖边区绥靖总司令，率兵十万，屡战屡败，退到大渡河时，只剩下一千多人。残部被解放军包围缴械，他缩在士兵中间企图蒙混过去，结果被他的士兵指认出来而成了俘虏。“老方被俘在前，可以说少受了许多罪。我们到后来给养困难，上面发下的经费都是大块黄金，

到那时，这贵重的财物却无处换粮食。即便不在大渡河被解决，也终不免饿毙！”

沈主任接着问：“据王陵基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给他九十万两黄金，要他设法化成小块，发给各部队作军需费用。他便交给重庆造笔厂去化成一两的、五钱的小块，每天大约只能化几百两。不知你们领到的黄金，是小块的还是四百两一块的大金砖？”宋希濂苦笑道：“大小都有。平时大家爱财如命，到那时大家都面对大块黄金叫苦不迭！因为用黄金去换粮食，大块的不易切开，切开了又不知份量。因此谁也不知如何是好。”

在谈到大洪山的情况时，沈主任叹息说：“当初我们很了解老方的个人历史，总以为他的本质比一般国民党嫡系将领要好一些，很想争取他做点工作。不料竟也如此顽固！”宋希濂解释：“我们这些人从黄埔军校受训起，就灌输了满脑子的‘不成功便成仁’思想，不这样也不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所以要我们很快转变立场是不可能的。”方靖也说：“作为军人来讲，成功成仁的决心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为谁成功成仁。在荆门战场上打到最后，假如不是脑子里已有了疑问，那早就‘成仁’了。”

沈主任说：“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说到这里，他用筷子指着方靖和宋希濂：“你们在被俘时都想过要自杀，那样的死，

就比鸿毛还要轻。现在你们获得了特赦，有了公民权，就是回到人民群众中来了。今后一定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目标，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

这样一顿或称之为顾旧瞻新的便饭，尽管是在餐厅吃的，于人情道理，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但是，过了不久，风云突变！

距这餐饭大约一年或更短些时间，“造反派”两次找方靖写材料，要他交代与沈德纯主任的“黑关系”。

“造反派”的逻辑是：“沈德纯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为什么要请你这样一个战犯吃饭呢？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他请你吃饭是有目的的。你是国民党的将军，他是共产党的叛徒，是一丘之貉，互相勾结起来，准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必有一本变天账！他还请了大战犯宋希濂，这就说明搞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一定有反革命纲领！你快把变天账和反革命纲领交出来！你当然懂得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你现在可以反戈一击，站出来揭发沈德纯嘛。只要你这样做，我担保你没有一点事，而且还可以受到优待。”

方靖听了，大吃一惊。他在改造机关关押了十七年，也曾写过许多人的材料。改造机关的领导从来都是要求他：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不加个人成见或推测。他从来没有被“勒令”写过这样“推理性”的材料。但是，不写不行，他只好如实写了。

“造反派”看了方靖写的《关于吃饭问题》的材料后，竟勃然大怒：“你写的都是些什么呀！尽是骨头，一点肉都没有！”方靖见对方虽然怒吼，却还攥着那份材料不肯松手，显然这“骨头”食之无肉，却弃之可惜，于是进而向他讨“肉”。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渡过几十年的人，即使再加上十条大喉咙吼叫，也是吓不倒的。方靖笑嘻嘻地请教：“请问这‘肉’从何而来呢？你看我这样瘦，浑身上下皮包骨头，要排骨倒是可以奉上……”

“废话！”“造反派”真气得七窍冒烟了：“我又不是飞禽走兽，要你的肉呀、排骨呀干什么？”但是他以下说出的话却不能帮他证明他并不是飞禽走兽：“这‘骨头’嘛，就是说……就是说没有‘肉’，这‘肉’嘛，就是有肥有瘦，吃起来才香。具体到你写的材料，就是光有经过——这就是‘骨头’，没有实质——这就是‘肉’了。实质嘛，就是要写上沈德纯如何利用这餐饭沟通你们之间的反革命感情，然后密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方靖忍不住插问：“沈德纯不是共产党员吗？不是党内很有地位的干部吗？”不料“造反派”公然宣判：“沈德纯是假党员！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已经被定性了！被打倒了！你不必顾虑他报复。大胆写吧，造反派给你撑腰！”

当方靖将第二份“材料”交上，“造反派”看到酷似第一份的复印件，便活像个皮球般的蹦跳着朝他吼叫：“不老实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如此，等等，伴着唾沫星子朝方靖喷射过来。方靖暗暗好笑，却抱着脑袋哼：“我的头晕得好厉害，可能血压升到三

百度了！”往床上一躺便闷声不响了。“造反派”转着圈子把他看了又看，象是在掂着分量。总算与飞禽走兽有点区别，还懂得这个特赦的瘦老头实际分量并不轻，于是“且战且退”：“真他妈的橡皮墙！你这样抗拒决没有好下场！”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件颇有恶作剧性质的事总算到此闭幕了。

沈德纯主任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含冤去世。

方靖至今提起沈老还深感悲痛。他说：“沈老如果健在，我相信他还能继续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是个军人，在战场上无愧军人的称号；他又是政治工作者，是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这样好的干部，竟被真正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叛徒、内奸所害，是令人很痛心的。”他承认：自己能够改造成为新人，原是在大洪山二十多天的战俘生活体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展极快，一九六六年进入六月份，社会上已有动荡迹象了。全国政协机关无法分配第六批特赦人员去参加劳动，便让方靖等人由东四旅馆迁至政协礼堂对过的锦什坊街家属宿舍来住，与先期特赦的王陵基住同一门牌，但不同院。

两间北房，杨光钰和牟中珩往里屋，方靖、孔庆桂、李佩青住外屋。

全国政协机关的领导对他们说：这是临时措施，时间可能会长一些。他们不能设想这临时会有多长。但是无论如何，从大集体生活转到小集体生活，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诸如碗筷、面盆、暖壶、痰盂等等之类的东西，都得逐一添制。由于无长

“文革”  
中的生  
活花絮

期打算，能共用的、公用的，都摊钱购买，做到了分文不让。尤其是尔后这“临时”随着形势而变得遥遥无期，他们又感到共用、公用不便，必须每人各备一份，在处理旧物及作价问题上，斤斤计较得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抛弃了“将军风度”，活象一撮小市侩。

住进宿舍的次日晚上，李佩青召开小组会议，商议今后的学习、劳动、生活等问题。他们觉得暂时不可能安排劳动，闲着拿政府的优厚生活费，于心不安，应该找点事做。最后决定把环境卫生包下来。这样既有利于群众，又可以补劳动课。于是从第三天起，每天早上四点半就开始打扫卫生。他们先从政协礼堂门前可容几十辆小轿车的停车场打扫起，然后再回来打扫几个院子，包括院内的厕所。他们住在这院子里的几年中，环境卫生一直可以称得起模范，也曾一度得到群众的赞扬。

在学习方面，开始时还是由政协老任负责领导，比较有规律。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持续开展，政协领导有的被打倒了，有的靠边站了，有的忙于造反去了，方靖等人的生活与学习也就无人过问。一度把他们的生活费降低为三十元（造反派的“倡议”），还是在敬爱的周总理关怀下，两个月后才补发并恢复原数。

由于政协领导挂“黑牌”，饭前先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然后到食堂站着吃饭，而且每餐菜钱不准超过一角钱，使方靖等人看了十分为难。因为他们总觉得这些有功于党、有利于人民的老干部竟受到如此待遇，而他们这些有罪于党、有害于人民的人，倒可以随便吃坐，实在于心不安；要是照着这些老干部

做吧，又有“牛鬼蛇神”之嫌，于是商量着自己起伙，在宿舍做饭。

这原本是两便之事——既可以随意做可口的饭菜，又可以少跑许多路去食堂吃饭，但是，这样一件小事，却在他们几个人之中，引起了不小的矛盾。

最初，政协机关给他们一个煤球炉子烧开水，他们便利用这个炉子做饭吃。五个人各做各的，却用一个炉子，这就发生谁先做谁后做的问题了。

孔庆桂声明：“我要先做——因为我是长期病号。在秦城是受优待的，在这里也应该受到优待。”

此事唯独李佩青反对：“老孔处处把尖，是军阀思想残余！”孔庆桂马上反攻：“你动不动就扣帽子，是党棍作风的具体表现！”

别人都不开口，两人吵了几句也就拉倒。李佩青孤掌难鸣，只好作了让步。

说孔庆桂“把尖”，实际上也并没有太冤枉他。这是他的“优越感”造成的。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炮兵科，在北洋军阀部队时，他是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抗战时期，他在六战区任炮兵指挥官，曾设计炮击宜昌日寇机场，炸毁敌机多架，以至于一个时期，日机不能从宜昌机场起飞去轰炸重庆。这件事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所以他在“国军”中被一般黄埔将领尊称为“孔老师”。

第二个做饭的自然让杨光钰了。他行动不便，必须照顾，这是任何人也没有异议的。剩下三个该怎么排队呢？前国民党第

二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先发制人：“老……老李是组……组长，最……最……最后做……老……老方第……第三，我第……第四！”弄得李佩青无法反驳。

当时不好开口的李佩青，却在此后频频发言——总是催人快做饭，少做菜。事实也是：一餐饭按每份半小时计算，从十一点做起，轮到他来做时，最早也要到中午一点以后。这对胃口极好的李佩青来讲，实在苦不堪言。何况一炉火也烧不了那么长时间，往往到该他做饭的时候，却需要添煤及至于加木柴了。

孔庆桂在任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时，专门有个扬州厨师为他做菜。扬州小吃是闻名天下的，足见这位司令的嘴很馋。特赦后第二天就想吃鱼，自这以后自然不仅想吃鱼了，而且平时零食、水果也不断嘴。他患有高血压，不宜多活动（在秦城是免劳动者），因此不免常常要麻烦步履轻捷的方靖和身强力壮的李佩青代为购物。他也不忘小施恩惠，常常将代购的零食、水果分一点点给方靖和李佩青，要人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他每餐要做几样菜，费火费时，耽误别人做饭，难免别人要提意见。他认为别人提意见犹可，方靖和李佩青是受惠者，不该再提意见。于是摔闲话了：“我常常请你们吃东西，你们一毛不拔，真好比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嘛！”要不是方靖和牟中珩拦阻，李佩青就会给孔庆桂一记耳光。李佩青没有打成，又见那四个似有“军界抱团”之嫌，料想自己也斗不过，便忍下一口气，掏出五角钱放在孔庆桂的书桌上：“我吃了你的东西，大约值五角钱。现在照价还给你吧。”孔庆桂反而气他：“不！不！”

我常让你跑腿，不给点小费就是我剥削你的劳动力了。”

李佩青再次忍下一口气，第二天跑去买了两斤骆驼肉，切成大块，吃过早饭就放在炉子上炖，一直炖到中午也没有烂，使下面几个人都无法做饭。从此各显神通，那火炉几乎从早到晚，十七八个小时都闲不住！

他们的脾气都很执拗，谁也说不服谁。这时，每周的生活会也不开了，有意见不能公开讲，往往各自生闷气，谁也不理谁。有时方靖的小孙女去了，见他们都撅着嘴搭拉着脸，便天真地问：“几位爷爷，你们都怎么了？”几个年近古稀的人，这才意识到脾气发得无聊，当着几岁的孩子，实在难为情，于是哈哈大笑，又和好如初了。

护理王陵基

正当“造反派”酝酿“夺权”之际，王陵基病情加重。政协机关整个领导班子瘫痪，李佩青和方靖只好去找“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这时正一脑子的“权，权，权”，哪里会过问？何况此事尚有“阶级立场”问题，更不肯管了。只说：“你们自己照顾吧——不好就送医院。”于是方靖、李佩青、牟中珩三人增加了护理王陵基的任务。所幸是一九六七年冬初，三个房间都有火炉，做饭还不甚紧张。

最初王陵基还能坐起，在房间里搀扶着也能走几步，但吃、喝、拉、撒、睡却要人护理。李佩青主张三人分班轮流护理；方靖也认为，他们与王陵基不住在同一个院子，可是王陵基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分三班轮流护理较好。后来三人太辛苦，孔庆桂自愿参加，又分为四班倒。岂知这位前国民党三星上将，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却并不领情，认为应该如此，每餐饭后把手一伸：“拿帕子来！”这是旧社会四川人上饭馆吃饭的派头，意思是要跑堂的拿擦脸的毛巾来。孔庆桂哪里能接受这一套！气愤地说：“他把我们当成听差了！我们有什么义务侍候他？”李佩青也常有怨言。方靖做好好先生：“算了吧，人家有病，我们就原谅一些吧。”尽管如此，孔、李二人总是不能顺着王陵基的要求去做，所以王陵基对他二人也总是口出不逊之词。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王陵基已不能起床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自然又增加护理上的困难。后来又浮肿了，病情危笃，方靖等五人商量着，从丰盛医院请了一位医生来诊。大概医生用了推尿的药，服药后大量排泄小便。

有一次孔庆桂“当班”，中途跑回来换衣服，说王陵基尿了他一身，样子十分狼狈。李佩青自告奋勇：“我去替你！”他去了不久也跑了回来：“他妈的！他尿了我一脸啦！”于是两人都说王陵基是有意报复他们。

王陵基在大量排尿之后，肿是消了，病情仍然继续恶化。五个人又商量，决定借一辆平板三轮车，把王陵基拉到白塔市人民医院看急诊。

经过诊断，医生认为要观察观察。方靖等人还希望医生能收留他住院，所以一直耐心守候在急诊室。其实他们想错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一个战犯——尽管是已经特赦了，总还是当作“阶级敌人”、“反革命份子”，有哪个医生敢冒丧失“阶级立场”的风险，收王陵基住院呢？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深夜，孔庆桂值班，中途回房，把

四个人叫醒：“快起吧，快起吧！”众人惊问何事？他“哼”了一声说：“我成了王陵基的孝子贤孙了！”大家这才明白：“老王他……”“对呀，老王寿终正寝了。”

深夜无法向机关报丧，也不能惊扰邻居，方靖等人悄悄来到王陵基房中，替他擦身更衣。

王陵基在大陆没有亲人，遗体火化后，骨灰盒寄存在八宝山公墓。方靖等人从八宝山回来，清理王陵基的遗物，将其变卖，连同他的银行存款及身边现金，共计人民币五百九十九元八角六分，一并交给全国政协机关当时掌权的领导人。

方靖将王陵基病故经过及遗款数目，都详细记在日记本上。当时看来是多此一举，何必记此与己无关的闲事呢？却不料十年后，他的此页日记，竟成了唯一可以查考的依据。

一九八一年王陵基的大女儿王锡礼从美国回国来取亡父骨灰，自然要问起亡父生前遗物。经过十年动乱，全国政协机关人事变动极大，加之“造反”阶段无账可查，这事看来很难向家属交代清楚，但是如果含含糊糊，肯定会造成长期影响。想不到方靖这本日记竟成了最权威的账簿，凭此向家属交代得一清二楚，使不远万里而来的王锡礼既满意又感激。

一九六九年八月下旬某日，孔庆桂去西单购物，归途中在群才胡同口被自行车撞倒。当时骑车人将他送进附近医院，借口去给政协机关打电话而逃之夭夭。后来还是医院通知政协机关，才把孔庆桂接回来。

现在轮到方靖等人轮流护理孔庆桂了。他倒没有王陵基的

架子，卧床以后每天除一磅牛奶外，别的什么都不肯吃。起初只认为是外伤，也因当时条件所限，没有积极治疗。

卧床数日后的严重便秘，李佩青买来开塞露通便。这个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找准肛门，以至痛得孔庆桂大叫不已，从此拒绝使用开塞露，弄得牛奶也不想喝了。

一个月后孔庆桂病情恶化，驻全国政协机关的军宣队派人到宿舍探视，决定送去住院。但是两次送去，均被人民医院拒绝，借口是“没有床位”。在当时政治气候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军宣队亲自出面去与人民医院掌权者联系，强调了毛主席的统战政策，指出特赦人员按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是必须予以照顾的。这才被接受住院治疗，但是为时已晚。

军宣队又立即给孔庆桂的夫人白玉华去信，请她来京护理丈夫。白玉华回信说：准备即日起程。但因当时有规定：国庆期间，外地人不准入京。因此只能等到国庆节后。

十月三日早晨，方靖在病房值完一宵的夜班，等待牟中珩前来接替。孔庆桂连连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来。方靖安慰他：“你安心养病吧，一半天嫂夫人就要来了，有她照顾，肯定你的病会好得快。”

方靖久等牟中珩不来，便回宿舍去找，原来牟中珩起床迟了，正在吃早饭。方靖便对他说：“你赶快去吧，看来老孔的情况很不妙，你要多加注意啊！”

下午郑庭笈去人民医院探望孔庆桂，护士对这个前国民党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说：“那个老头死了。刚才有个老头看着他，吓跑了。”她指的是牟中珩。又问：“你怕不怕？”郑庭笈暗暗好笑，

心想：“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说给你听，倒会把你吓跑。”

其实牟中珩是跑回宿舍报信的。方靖等人闻报，急忙重返人民医院。此时孔的遗体已移往太平间。他们化了五元钱，才取得太平间看守人的同意，把孔庆桂遗体拉出来擦拭、更衣。

这位前国民党江阴要塞中将司令、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病逝时年七十七岁。

几天后，孔庆桂的夫人白玉华从贵阳赶来，受到驻全国政协机关军宣队的很好接待。特赦后孔和夫人始终没有见面，自然是件很遗憾的事。白玉华在北京停了两天，料理完一些事，取了孔庆桂的骨灰及遗物变卖后的现金加存款，共二百八十二元三角五分，回贵阳去了。

为杨光  
钰治丧

三个月后，即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上午，方靖等人在全国政协机关文史办公室学习，中间休息时，有人问到杨光钰的近况（因杨的假腿行走不便，很少出外活动），李佩青说：“老杨发胖了。他爱吃猪肉，吃了又不活动，跟填鸭一样！”这话未免太刻薄，所以遭到许多人攻击。后来郑庭笈说要去看看杨光钰，大家也没有在意。不料他去而复返：“唉呀，老杨死了！”众人大惊，急忙赶到宿舍，只见杨光钰横躺在床上，他的一条假腿已经解开。从现象上分析，有可能是突然感到不适，想要上床躺下，但已来不及了。方靖摸摸杨光钰的身体尚有余温，便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让人去报告军代表。全国政协机关即派车来将杨光钰送到人民医院要求抢救。医生检查后摇摇头：“不行了！”

又是方靖、李佩青、牟中珩三人替杨光钰更衣，擦拭，送八宝山火化。因为这位终年七十一岁的前国民党第二军中将副军长在大陆没有亲属，只得将骨灰寄存公墓。他的遗物变卖后所得现金及银行存款共六百八十八元三角，上交给全国政协机关当时的领导。

所遗憾的是：杨光钰在海外的亲人，至今没有信息。

王陵基是一九六五年第五批特赦第一名。特赦后一年多时间里，曾写过一些颇有价值的文史资料。一九六六年六月份，他对方靖说：“我还有一些材料要写。”但是此后情况的发展，已经不容许他再写了。这个蒋介石的同龄人在国民党上层日久，与蒋介石接触颇多，所以肯定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对了解蒋介石其人及其集团的内幕，以及他参预或耳闻目睹的某些情况的真相，会有极大的帮助。孔庆桂、杨光钰特赦后，几乎没有留下片纸只字，这就更可惜了。

在这之前的一两年中，爱新觉罗·溥仪、王耀武、廖耀湘等人都相继病故。由于政治动乱的影响，都没有举行追悼会。除溥仪外，也都没有在报上发布讣告。尽管如此，比起成千上万老干部在此一时期挨斗、抄家以至惨遭迫害等等，仍旧是很优待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六六年“八·一八”红卫兵运动，一些受蒙蔽的中学生走上街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挨门挨户抄家打、斗，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程度。但对于这些起义、特赦人员的家庭，却丝毫没有碰一碰，这都充分说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始终深入人心，连这些政治上十分无知的孩子，也懂得应该对这些人员持谨慎态度。

倒楣的事又轮到方靖头上了。

一九七〇年元月二十日中午，也就是在杨光钰病故后不久，方靖在宿舍里吃了午饭，急急忙忙去机关上班。在穿过政协礼堂大坪的时候，被一个学骑自行车的女孩子撞倒。当时不知已经骨折，把女孩子放走了。等到李佩青、牟中珩出来，发现他坐在地上爬不起来。他们把方靖背回宿舍，次日才送往人民医院诊治。一位年轻的医生先看病历（那上面第一页写明了身份），然后态度严肃地走到诊治台前，用力举起方靖一条腿，上下左右一阵乱晃，尽管方靖痛得直叫喊，他却无动于衷。

检查结束了，医生坐下来，提笔在病历上写了六个极难认清的字：“大腿肌肉挫伤”。一盒跌打丸，六片索密痛，就完成了整个诊治“作业”。李佩青壮着胆请教这位严肃多于医德的医生：“请问：他的伤……”“休息两天就好了！”医生极不愉快地回答。“该谁了？”他扭头朝门外呼唤，使李佩青明白：赶快走吧。

医生的冷漠无所谓态度，使李佩青怀疑方靖的伤是否真有他表现出的样子那么重？因此他几乎不愿再背方靖上汽车。

几个“两天”都“休息”过去了，方靖的“挫伤”并不见好转。他也不愿再去人民医院见那位医生的尊容了，要求李佩青找辆平板三轮车，将他送往近在咫尺的丰盛医院诊治。

当然，尽管是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绝大多数人还是正直的。丰盛医院一位正骨老医生认真地为方靖作了检查，诊断为骨折。后来经X光照相，证实了这一诊断完全正确。

方靖是很能咬牙的人，他接受了孔庆桂卧床的教训，只躺

了十多天，便起床活动，两个月后又拄着手杖外出散步，因此没有增添别的病。由于腿疾，他征得全国政协机关领导同意，搬到儿子家中居住，提前实现了祖孙三代欢聚一堂的宿愿。

儿子家距全国政协机关不过二、三华里，但对瘸了一条腿的方靖来讲，却是够远的了。他天天坚持上班，而且至少要在办公室里坐十小时以上，好些年都坚持这样做。

这里仅举一例说明他的倔强个性：

一九七七年国庆节，方靖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的请柬。他原是不好娱乐的人，开头不打算去。他在政协礼堂开会时，听领导说：今年参加晚会的人多，汽车派不过来，所以能去的就自己去，不能去的可以不参加。他回家生了半天闷气，还是决定去。到了晚会这一天，下午两点钟就拄着拐棍走出家门了。孙儿孙女追出去问他哪里去，他气呼呼地说：“既发请柬，又不派车，岂不是欺我人老身残吗？我要让领导知道：我方靖并不老，也没有残废，还能再活二十年，为国家做二十年贡献哩！”

孙儿孙女无论怎样劝阻他都不听，谁敢拦他就举棍敲谁。连劝他坐一段公共汽车他都不肯，坚持要步行到人民大会堂。如果乘公共汽车去人大会堂，是九站路程。当下午五点，政协机关派车来家接他时，他已经步行走到了天安门！司机听说后十分着急：“唉呀！方老怎么这样性急！他偌大年纪，万一路上出点事怎么好呢？”这天晚上，司机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守着，不敢离开一步，唯恐他又步行回家。

晚上方靖回到家中，自然消了气，不免有些抱愧地自言自

语：“唉！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指的是不该怀疑党的政策。事后才弄明白：当时领导说不派车是泛指到会的人，并不是说他们这些人也不给派车。

**最后一  
批特赦**

一九七五年元月，在一次宴会上，杜聿明、宋希濂等与叶剑英、徐向前元帅同桌进餐。宋希濂对徐向前元帅说：“不知徐副委员长还认识我吗？我叫宋希濂，五十年前我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期同队同学啊！”徐帅注视宋希濂良久，才点点头。未及答话，叶帅在一旁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已经批准将你们的人全部释放。”

杜聿明、宋希濂把这个好消息带回来，尽管大家称贺，但是心里却有疑团。因为一九七五年两报一刊的“新年祝词”中，明确指出以批林批孔为主，要求“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抓起来”，号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共同战斗，奋勇前进”！火药味如此之浓，说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还在向纵深发展。如此这般的政治气候，能够释放全部战俘吗？自然，这怀疑谁也不敢说出口来。

然而，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提出建议，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报道说：这次特赦战犯共二百九十三名，其中有蒋帮军官二百一十九名，党政人员二十名，特务五十名，伪满战犯三名，伪蒙战犯一名。至此，在押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这次的特赦与前六批有所不同。其原则是：遵照毛主席的

指示，对这次特赦的全部在押战犯，给予公民权，可以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就养起来。愿意去台湾的发足路费，也可以再回来。每人发零用钱一百元及新装等，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

最后一批特赦的第一名是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方靖在一九六六年获特赦出狱后，住在东四旅馆的第三天，黄维的夫人蔡若曙去拜访他，十分焦急地探听黄维的情况。方靖竭力安慰，说黄维近年来改造大有进步，因为特赦人数有限，总有个先后，估计下一批特赦当不至再有问题。越数日，蔡若曙又专程到方靖家里，想进一步了解黄维的情况。方靖仍旧是好话多讲。客人走后，方靖才对儿子说：“既然没有获得特赦，就很说明问题了。黄夫人要再三问，无非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多少得些安慰。假如我实话实说，她会很痛苦，也会埋怨黄维。但是，黄维那种宁折不弯的脾气，是掰得过来的吗？”说罢，叹息不已。

这次黄维竟会是特赦的第一名，方靖和许多知情人都十分惊讶。“黄维真的转过弯来了吗？”这是共同的疑问。

但是，在北京饭店由叶帅主持的招待会上，黄维的发言，使方靖等人不得不承认：“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黄维在发言中认罪说：“我们过去维护了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心口如一，不是通过这些年的改造，认识了自己的罪行，他决不会这样公开承认。

黄维的认罪，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改造战犯的政策的重大胜利！

后来黄维等人还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感激信。这封信由叶帅转呈，毛主席阅后即批发文件，转全国县团级以上干部传阅。

黄维在北京饭店宣读致毛主席的感激信时，刚一开口，在场的特赦人员便下意识地打了个立正，发出整齐的“唰”响，使得在一旁采访的记者及工作人员们一愣！

方靖以“先进者”的身份，带着孙儿去前门饭店看望这些新近特赦出来的老朋友。这些“后进者”已与社会隔绝了二十六年之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他们更是被封闭在小圈子里，所以都极希望从“先进者”谈话中，了解一些新社会的知识。因此，方靖每到一个房间，就会被包围在中间，邻室的人也闻讯而来，把房间挤得满满的。方靖每说一句话，都会有许多脑袋凑过来，他们唯恐漏听了一句“经验之谈”。

有人向方靖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北京回原籍了，据说北京的烤鸭世界闻名，不知我们能不能去尝一尝？”这使方靖想起自己特赦出来在东四旅馆与李佩青等人十分严肃地讨论“吃鱼问题”的事，不禁哑然失笑：“去吧，吃吧，谁也不会干涉的。”有一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千万不要象刘嘉树那样，吃多了一夜拉稀八九次！”

黄维成了大忙人。方靖在饭店里转了好几小时，竟没有找到他。还是等绝大多数人离京后，留京人员也安顿下来了，黄维才去方靖家拜访，两个老朋友畅谈阔别。

黄维与方靖的亲密关系，自然是无话不谈。黄维告辞后，

方靖对儿子赞叹说：“黄维果然变了。这个后来者必然居上啊！”

任政协文史专员

黄维等二百九十三人的特赦，也解决了方靖、李佩青、牟中珩等三个第六批特赦留京人员的工作安排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方靖、李佩青留北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工资定为一百元；牟中珩回原籍济南，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工资亦定为一百元。黄维按全国政协委员待遇，工资定为二百元；文强等人按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待遇，工资定为一百元。

一九七六年年初，文史专员组改组，原先的组长李佩青、副组长李以励落选。新当选的组长是文强，副组长是董益三、沈醉。从年龄、身体情况及活动能力来讲，这三位都很合适。但是，他们三位却惶惶不安，理由是：我们三个特务当组长合适吗？后来领导解释：特务是过去的历史，现在你们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了，不必再翻老账。这才算定下来。实践证明，他们是称职的组长，迄今能坚持每天上班的，有文强和董益三两人。尤其是文强，处理文史资料来稿、与在家休养的委员们联系、传达上级指示、递送文件等，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赴西安、延安等地参观

一九七五年六月，统战部组织一部分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去延安、西安等地参观，并定六月七日由北京飞往延安。不料六月四日方靖患感冒发高烧，虽经积极治疗，到动身的这一天体温仍在37摄氏度以上。当时方靖已经七十五岁，带病去乘飞机，显然是不适宜的。但是他很固执，还保持当将军时的信念：每一行动，一经决定，就不能改！真使他的儿孙们捏了一把冷汗。

所幸结果很平安，也足见他的体质甚强。

在参观途中，方靖写了满满的两本笔记。下面是其中的两则：

六月二十一日，他们在陕西宝鸡市参观访问了宝鸡峡和冯家山水库。方靖写道：

“我们去实地参观，工程确实宏伟。当地的条件极差，能将这样的水利工程兴建起来，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实现。在群众座谈会上，当地贫下中农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说旧社会官府只知横征暴敛，不管老百姓死活。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亦是蒋冯、蒋唐军阀混战之时）遇旱灾，十家有九家抛儿弃女，外出逃荒。这一带历来是：下雨水上涨，天旱出门把饭讨！在共产党领导下，年年兴修水利，旱田变成了水浇田，彻底改变了旧社会的贫困面貌。

“是晚我们在宝鸡市招待所住宿。

“这一夜我几乎通宵失眠！因为我想起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七十九军军长时，奉命率部出川，九十八师由四川万县、梁山空运宝鸡，阻止了宝鸡市提前解放。当时我还夜郎自大，妄图阻止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南。

“这次参观，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确实是维护了万恶的旧制度，罪恶滔天！

“假如今天我仍旧作为一个战犯来到这里，我的心情也许还可以平静一些。但是，今天我们来，当地政府和人民把我们当成贵宾，享受了优礼厚待，怎不令人愧悔交加呢？

“特赦后我曾经想过：过去的好比昨日死，今后要重新生。

我们这些人，过去在军队中几十年，干了不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事，阻挡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使千百万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要活一天，就要受一天良心的谴责。所以，我希望在台湾的黄埔、陆大学长们，汲取我们这一教训，切勿做‘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之罪人。”

七月六日上午，他们参观访问了河南郑州市北的花园口人民公社。方靖写道：

“西黄流大队队长李云介绍情况时说：花园口也就是当年蒋介石下令决口之处。决口后这一带变成了一片汪洋，殃及豫东、皖北、苏北，受灾面积达五万四千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千二百四十万，死亡八十九万人。当地被全部冲走的有二十五个自然村，一万九千多人。有个绍桥村，六十四户，决口后其中三十一户只剩下一个人。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又妄图以黄河水阻挡解放军大军，再一次犯下了滔天罪行！”

“过去我并不知道蒋介石采取这一措施引起了多大恶果，只是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在战争中实行焦土政策不乏先例，而且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至于使用这一手段，必须付出一定代价，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与其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给敌人以趁养战的条件，毋宁将其毁弃，使敌人无立足养息之地。但是，使用这一手段，必须有充分准备，其中包括疏散人口、妥为安置等问题，这是极普通的常识。蒋介石作为当时的领袖，却没有做任何准备、动员工作，几乎是在老百姓睡梦中悄悄决口的，以至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死亡！更令人愤慨的是，也没有做事后的安置工作，甚至连军事上的

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因此决口之后，并没有阻挡住日寇的进攻。老百姓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结果却毫无意义！

“蒋介石做出此一决策，说明他心目之中根本没有人民群众，事后无军事上的配合，也说明他根本无决心抗战。他的抗战，完全是西安事变和全国人民一致强烈要求所逼出来的。他做这一决策时，肯定有参谋部将领参加，竟没有一个将领进谏并提出必须做的事前事后工作，也说明我辈将领完全是为蒋介石效命，心目中也没有人民群众。因此打起仗来，哪里还会顾老百姓的死活呢？”

“共产党在建国以来就着手治理黄河，并改造千年为害的黄河为人民造福，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七月十四日上午十时，他们乘飞机返回北京，结束了这次历时三十七天的参观访问。

方靖在笔记的末尾写道：

“这次参观访问，使我深受教育。

“河南一带的情况，过去我是很了解的，因为军阀混战时期我在这一带打过仗。天灾人祸，使老百姓常常流离失所，贫困不堪。通过这次参观，我亲眼看到河南的工农业在解放以后有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共产党建国以后便治理黄河，并利用黄河水建造水电站，为人民造福。而蒋介石自一九二七年北伐到南京，至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在大陆掌权二十又二年之久，可以说没有在大陆任何一块土地上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却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

“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确实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的，国民党确实是反动派！”

一九七六年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覆灭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一提起粉碎“四人帮”，方靖总是心悦诚服地说：“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但能够战胜外部敌人，也能够有效地清除内奸，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成千上万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干部和更多的群众！”

一九七八年三月，邓小平担任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齐燕铭任秘书长。政协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闲置了十年的文史专员们，也有了具体工作可做——恢复了文史资料的撰写和审核工作。同时海外不少黄埔将领归国访旧和参加会议，他们见了面互相交流情况，使隔绝了多年的国内外联系逐渐有所加强。

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日益好转，历年来的冤假错案都得以平反，全国出现一派安定团结的气氛。一九八三年六月，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方靖当上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接到不少旧部下的来信，都是向他道贺的，并告诉他，他们已得到当地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最使他感到高兴的是：正值六届政协开会期间，他在七十九军当军长时的参谋处二科中校科长来北京看望他，即是当年在荆门战场上向解放军挥白手帕要求投诚的李印玺。

李印玺是从四川雅安来京的，当时已六十三岁。他告诉方靖：四川解放以后，他曾在泸县军管会工作过一段时期，后来

便与妻子巫明义到雅安去教书，尽管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却未受过冲击。李印玺已经退休，由于他是民革成员，退休后又被聘请去雅安中山业余学校主持工作，至今朝气勃勃不服老！

方靖十分崇拜周恩来总理，迄今在他的书桌上还端端正放着周总理的遗像。他说，他在黄埔军校受训期间就见过周总理，后来在抗战时期也曾多次见到周总理。他引为终生遗憾的是：在特赦以后，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接见。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邓颖超主席接见与会代表。方靖回到家中赞不绝口：“只有周总理如此伟大的人物，才会有邓主席这样高尚的伴侣！”原来他指的是邓颖超主席的讲话一开始就说：“我讲几句话。讲话就是讲话，不是什么‘首长指示’，也不要搞什么‘首长指示’……”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就爱搞“首长指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利用“首长指示”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时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某某首长指示，不论是否正确，群众都必须象圣旨一样听从。十多年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习惯，只要是领导人讲的话，无论其职务大小，都冠以“指示”二字，也含有毋庸置疑的意思。邓颖超主席德高望重，是全国人民敬爱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如此谦虚，怎不令人感动！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方靖和一些老朋友见了面，总是说：“我们要争取再活二十年，看到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看到祖国的统一。”但是，他们在一起谈到祖国美好前景时，更多祝愿的是：邓小平主任、李先念主席、胡耀邦总书记、邓颖超主席、徐向前元帅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康长寿！

寄语台湾海外袍泽故旧

最后，方靖要求笔者借一篇幅，对在台湾和海外的黄埔、陆大学长及故旧讲几句知心话：

自从一九五九年第一批特赦战犯以来，迄今已二十五年。即便在风云多变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特赦人员仍旧是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关怀下受到优待的。我们被俘之后，有许多人的家庭已经离散。特赦以后，只要还在大陆的亲属，人民政府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取得联系，并尽可能帮助我们与家人子女团聚。有些人的亲属已去海外而无音信，或是病故，也都在统战部门的关怀下重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象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赵子立、杜建时、董益三、黄维、沈醉、文强……等人，都在特赦后结了婚，过着安逸、舒适的晚年生活。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外地或海外的故旧，也与我们在京人员恢复了联系。象朱鼎卿、赵秀昆、杨达（我在十三师时的参谋主任）等人，都在来京开会或办事时见过面，有的通了信，象龚传文等人。因为他们是起义将领，更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待遇比我们好得多。

这些年，在海外的原国民党将领以及他们的子女，不断有人归国访问、探亲或教学。在特赦人员中，也有去海外的，如宋希濂去美国定居，这次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及纪念黄埔军校成立六十周年活动，他们赶回国来了。他们将海外情况告诉了我们。当然，他们也会将我们的情况告诉海外袍泽故旧。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八〇年，我见到了过去在九十八

师的老上级夏楚中的女儿夏开莉。她同她丈夫从美国归国教学三个月，特到全国政协机关看望我。因为他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我未能尽地主之谊，一直甚感抱歉。一九八四年，我又见到了夏楚中的儿子夏天长，从而获悉夏楚中的近况，毋任欣慰！他亦是应邀归国作短期讲学的。

一九八一年我还见到了去美国探亲归来的蓝瑞生，他是我在原国民党十八军任副军长时的同事，当时他在十八军任少将高参。据他告诉我：他在美国期间，曾见到何应钦先生，何先生很关心地问到大陆还有哪些原国民党的将领健在。这说明当年我们黄埔军校的老师——我在潮州分校时的代校长，对我们是很关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又何尝不想念当年的老师和袍泽故旧呢？我们更大的希望，便是能早日欢聚一堂，促膝畅谈三十多年来的阔别情怀。

祖国的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在台湾和海外的袍泽故旧，已经徘徊观望了三十五年之久！人生几何？是到了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我们这些起义、被俘将领身上得到了最现实的体现。我由于腿疾，已不能亲到海外拜望老友，只能于此处寄语：在已经闲置了少年头的今天，如再犹豫不决，必将造成终生最大的遗憾！

有人说“共产党的政策多变”，这是十年浩劫造成的恶果。事实并非如此。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革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这两条原则今天没有变，就是在那动乱的十年中，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也没有变。当那些有功于国家、诚诚恳恳为人

民服务几十年的共产党老干部挨斗、坐牢，甚至迫害致死的残酷斗争中，我们这些人仍旧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保护下，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这充分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是稳定的。

犹豫是铸成大错的原因之一。当初荆门战役打响之前，我的信心动摇了，在脑子里也闪过起义念头，但又被侥幸心理所毁掉，失去了争取共产党和人民谅解的大好时机，终于成了战俘。当然，那时的犹豫，也是对共产党政策的不了解、不信任。总以为自己跟共产党真刀真枪打了那么多仗，给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造成那么多损失，决不会得到共产党的宽大和谅解。今天情况不同了，三十五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政策，全世界有目共睹，尽管由于某些原因走了一些弯路，而总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现在，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领导人在掌舵，近几年来在大力培训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干部，各种培训干部的高等学校一个个创办起来，就象当年办黄埔军校一样。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正在整党。这些措施，都保证了共产党既定政策的连续性和永久性。

自从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海外袍泽故旧回国探亲、参观的很多。我认为能够回来看看实际情况，和我们在大陆的老朋友见面聊聊，也比在祖国大门外徘徊观望好得多。

我的这些话，卑之无甚高论，却是出自肺腑，希望台湾和海外的袍泽故旧三思。

本书几经易稿，终于问世。定稿前曾经方靖委员亲自审阅修改。其中有关六见蒋介石的部分，还承文强委员审阅，提出了宝贵意见。书稿的抄写誊清工作，得到张润巧、陈虹、于学君、周桂秋、张蓉蓉、吴志安等同志的大力协助。特在这里一并致谢。

作者 一九八五年二月

[ General Information ]

书名 = 今是昨非见肝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靖亲历纪实

作者 =

页数 = 356

SS号 = 0

出版日期 =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jn.com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上卷 从小兵到将军

- 第一章 当兵前后
- 第二章 参加混战
- 第三章 “围剿”失败
- 第四章 八年抗战
- 第五章 驻军四川
- 第六章 军情火急

下卷 从战犯到人民政协委员

- 第一章 历史硝烟
- 第二章 终于被俘
- 第三章 得过且过
- 第四章 辗转关押
- 第五章 接受改造
- 第六章 走向新生

附录页